

探尋面對「整體」的「個體」「蹤跡」

——重評《創業史》

◎ 傅書華

《創業史》是「十七年文學」中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其思想模式、主題類型、人物配置、情節結構等等不僅與「十七年文學」中的代表作品《三里灣》《山鄉巨變》、《艷陽天》等具有嚴格的同構性，¹而且在思想特質、美學風貌方面，也與「十七年文學」中佔據主導地位的作品如《紅旗譜》、《紅岩》、《青春之歌》等有著深層上的同一性。²研究十七年文學，儘管可以打撈出新的作家作品，並對之從新的向度給以價值重置，但《創業史》仍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猶如研究二十世紀思想史、文學史的人，都要以魯迅為對象或參照以一測自己的研究高度一樣，《創業史》在十七年文學中，也佔據著同樣重要的位置。本文試圖通過對梁生寶、素芳等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討一下是甚麼原因使個體生命自覺地投入「整體」的懷抱，投入之後的個體生命形態如何；探討一下被「整體」排除在外的個體生命的殘損形態及其原因，並相信這樣的探討對理解一代中國人——絕不僅僅是農民——的人生歷程、精神歷程也不無益處。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是甚麼使梁生寶自覺地放棄個人發家的機遇而投入合作化的潮流亦即投入「整體」的懷抱呢？或者我們要深入追問的是，是甚麼使一代中國人自覺地放棄了各種各樣個人發展的機遇而投入「整體」的懷抱呢？

在《創業史》的開篇，作者生動地為我們描述了梁三老漢、梁生寶三起三落的發家史，個人發家，非不願也，乃窮盡人力在其時而不能也，於是，用激進的方式，從根本上進行的變革——土地改革，在其時的發生也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雅卡爾（Albert Jacquard）在論述教育、文明程度都較高的德意志民族為甚麼會淪入二戰悲劇時曾指出：「最令人寬心的解釋歸結為失望，1918年的戰敗、通貨膨脹還有失業使德國人陷入了失望之中。他們失望到了似乎任何帶來變化的解決辦法都可以接受的地步，」而當時的執政者確實「給他們帶來一次根本的變革」，³在這樣的根本變革中，「與民主的緩慢進程相反，」變革「帶來立竿見影的高效率。它使所有人不必抱著分擔一項共同事業的責任的思想去決定任何事。倘若一些人聲稱自己掌握真理，積極地描繪出接下去的道路，並且在最初一段時期裏證明他們確有能力改善現狀，人們怎麼會」不接受他們呢？作者並且引證說：在其時執政者「上台兩年後，一切在德國人看來正在發生多麼大的好轉！」⁴當然，任何類比都是蹩腳的，甚至是荒謬的、荒唐的，但是，在說明某些人類的精神現象時，他民族的精神歷程、精神悲劇還是對我們有著啟示意義的。在《創業史》中，在經歷了三起三落的發家史，窮盡了自己的全部心力後，梁三老漢對任何災難：「平靜而且心服」，他「再也不提創家立業的事了」。正是在對現狀對各種努力極度失望的「語境」中，土地改革這樣的在「確實」「改善現狀」時「立竿見影的高效

率」的根本變革，給農民帶來了切實的巨大利益，得了農民的絕對信任，燃起了農民對未來的熱切希望。在這樣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堅定不移地走互助合作這一「積極地描繪出接下去的道路」也就成了他們自然的必然的選擇。如果靠「個體」的力量總是歸於失敗，如果「整體」顯示了自己「確實」「立竿見影的高效率」地為個體生存「改善現狀」的巨大威力，個體還有甚麼理由不毫不猶豫地投入「整體」的懷抱呢？個體還有甚麼理由不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由「整體」去給以安排呢？正是在這種毫不猶豫中，個體在自覺不自覺中失落了自己的主體性，那就是每個個體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獨立思考，「所有人不必抱著分擔一項共同事業的責任的思想去決定任何事」而一任聽憑「整體」去給以安排。

在《創業史》中我們看到，不是所有的「個體」都會因失望在投入「整體」的懷抱後，自覺地去走「整體」為其「積極地描繪出接下去的道路」的，梁三老漢、郭世富、郭振山就是對其經歷了觀望、彷徨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梁生寶則是對其最為積極主動者，是甚麼導致了二者的這一選擇上的極大不同呢？梁三老漢、郭世富、郭振山都是背負歷史的沉重負荷，在歷史的慣力下，沿舊有軌跡「受動地」蹣跚者。這種沉重負荷或是經濟的，或是人生方式的，或是文化觀念的，只有梁生寶作為青年人，沒有或較少這樣的歷史負荷，又由於青年人總是從生命的理想角度而不依既定的社會現實規範去面向未來，所以，為個體生存「改善現狀」「確實」產生了「立竿見影的高效率」的「整體」所「積極地描繪出接下去的道路」，對梁生寶這樣的青年人就有了無法抵禦的誘惑力。遙想五四時代，接受新思潮新觀念的，主要是年未及四十的青年人，所以魯迅曾自言其信奉的是進化論，這對一向推重經驗感知崇尚老者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啻是強烈的反叛之聲。及至五四大潮過後，也曾有過「四十當殺，壽則多辱」的時代之聲，魯迅、周作人在年過四十後，不是被視為「封建余孽」就是以「老人」自居，那其中也正是因了青年崇拜情結作用的結果。要言之，青年對新事物的追求是一種因其沒有歷史負重的天性，只是我們往往視政治經濟地位為決定一切的因素，用人的社會性完全取代了人的自然性。同時，我們也往往忽視了，在青年性質的追求中，不僅有鮮花在召喚，卻也有著將慘遭滅頂之災的陷阱在等待。

但是，與五四時代青年人選擇不同的是，五四時代的青年人，在對傳統社會喪失了生機的現狀完全失望之後，在各自不同的教育所形成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下，面對著多種新的社會構成、文化資源、思想信息的刺激與選擇，而梁生寶自身及其所處的環境都不具備這些。從梁生寶所處的社會構成看，梁生寶面對著一個政教合一的強大「整體」，這一「整體」在三個方面構成了對梁生寶的吸攝力。第一，經濟方面。通過貸款、科技、統購政策等等，使梁生寶所帶領的互助組在經濟方面取得優勢。第二，社會尊重方面。通過佔據社會主導位置的政府機構的倡導，使梁生寶成為在社會中受到尊重的人，從而滿足了梁生寶如馬斯洛所說的「歸屬和愛的需要」「自尊」的需要。第三，思想方面。梁生寶並不具備其值得倚賴可供其獨立的思想資源、人生資源。你讓他在縱向上相信前輩的經驗麼，那只是已經讓他有了親身感受的失敗；你讓他在橫向上尋求新的思想資源麼？小農生產的封閉性障蔽了他的兩眼，於是，「整體」所提供的思想就成為其惟一的精神營養、思想資源。

如上所述，梁生寶自覺地進入整體，成為整體中的一員甚至代表，就是再自然再合情合理不過的事了，而這樣一來，他也就「不是被看做有血有肉自我實體，而是被假想成意識形態、思想主張……的惟一代表」了。⁵作為這種惟一代表的個體生命，其在生命塑形中的主要構成成份及其生命形態又是如何呢？這正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問題。

獻身的精神。這種獻身的精神最初來自於基於自己切身利益的長久不能實現的希望終於得到

了實現。梁生寶正是因土改使自己長久不能實現的得到土地的希望終於得以實現，從而使自己對「整體」充滿了信任與信賴，並因了這種信任與信賴，即使對互助合作這條「整體」所設計的「接下去的道路」暫不能深刻領會，暫不能直接看到給自己帶來的好處，但也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並在行走中，使自己完成超越「個體」，使「個體」完全融入「整體」的過程，從而使自己的行為上升到了「獻身」的層面。《創業史》通過韓技術員之口，就發出了這樣的普通農民是如何成為成熟的「幹部」的感慨。

正是因為有了上述的獻身精神，也才會具有無私的品格。這種無私的品格，在《創業史》中，集中地體現為梁生寶與梁三老漢的衝突，體現為梁生寶放棄對改霞的情愛。在中國這樣的一個有著悠久的重家庭重家族傳統的國度，再沒有比同時對抗、放棄血親、姻親關係更能體現自己的無私品格了。

符合「整體」所要求的行為規範，諸如服從、務實、謹慎及一系列的道德操守等等。如果說，獻身的精神、無私的品格可以歸入青年的品性，那麼，符合「整體」所要求的行為規範，則可以稱之為具有了中年人的「成熟」，用作品中的話說，梁生寶就是既有「青年的熱情」又具有「中年人的老成」。你看他剛剛與改霞談戀愛受挫，馬上就能從沮喪中灑脫出來，認真地有萬商討、挑選買多大的鐵鍋對進山的互助組更為實用；你看他在他領導的互助組取得了巨大成功後，卻又奔赴新的工作，而絕不浮名於歡慶成功的場合等等，而我後面將要述及的他對素芳的態度，則體現了這種「成熟」的另一面。如果說，「青年的熱情」體現了對現實的變革，那麼，「中年人的老成」則體現了對傳統的熟諳及運用的自如，二者的有機結合，怕也正是梁生寶所處時代的一個時代特徵吧。

當我們搞清楚梁生寶作為「個體」自覺地投入「整體」懷抱的成因後，我們也就便於理解梁三老漢、郭世富、郭振山、姚士杰之所以或半自覺或被迫歸入「整體」之中了。梁三老漢、郭世富由於歷史形成的種種重負，只有在梁生寶這樣的先覺者驗證了投入「整體」懷抱後，「個體」利益的能夠獲得，他們才會步之其後，從這一點上說，他們與梁生寶投入「整體」懷抱雖有「先覺」「後覺」之分，但其投入的路向基本一致。郭振山有所不同。郭振山較之梁生寶要更早些成為「整體」中的一員，他的最大恐懼是被「整體」排除在外，所以，他寧願在徹底撤股中個人經濟受損失，也要得到「整體」的認可，所以，他的喜怒哀樂無不與「整體」對他的認可息息相關，他最不能忍受的最懼怕的是「整體」不認可他時的孤獨，你看他那麼壯的漢子，居然會因此大病一場萎靡不堪，而在小說結尾，一旦重獲「整體」信任，又會整日精力充沛地鐵皮喇叭不離身地奔忙。雅卡爾在重新解釋薩特的「他人即地獄」時說：「被他人排斥在外就是地獄」⁶郭振山所懼怕的正是這種被「整體」「排斥在外」的地獄感，如果梁生寶有朝一日由於種種原因不被「整體」認可，他也是會有這種懼怕的地獄感的，因之，梁生寶與郭振山是有著某種相似之處的。這種地獄感的可怕，在其後的十年浩劫中，許多人是有著切膚地感同身受的。那麼，姚士杰呢？姚士杰在個體與個體的對抗中，底氣十足，但一旦面對「整體」，則底氣頃刻崩潰盡失，你看他在群眾沒有湧入他的院子時，是多麼貌似不可一世，一旦湧入他的院子，不是乖乖地交了統購糧了麼？這就是「整體」的強大的威懾力，對這種威懾力的強大，在其後的十年浩劫中，許多人也是有著切膚地感同身受的。60年代，北大的嚴家炎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認為梁生寶的典型性不及梁三老漢，此論在其後得到學界的首肯並隨著理論的更新如「中間人物論」、「合力說」等而不斷得以深入，但如果我們從「個體」與「整體」的關係給以考察，我們也許會發現，較之梁三老漢，梁生寶的形象還是更富於典型性的。

在通過梁生寶的形象分析，在個體生命與「整體」的關係中，探尋了歷史運行過程中個體生

命的「蹤跡」後，我想，還有這樣三個問題值得我們去深思與辨析：

第一，「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真實的集體」與「虛幻的集體」。馬克思說：「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能有個人自由」。在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中，馬克思認為：以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是否認可和成全為價值標準，「集體」被相機判為「真實的集體」與「虛構的集體」（「虛幻的集體」）這兩種「集體」分別配稱於以之為存在對象的兩種「個人」，即所謂「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馬克思還認為：在生產力與交往形式或個人活動與交往形式相適應或相諧調的情形下，個人是一定程度地實現著其個性的個人，反之，交往形式對於個人就成了外在的偶然的東西，而個人也因著以這種交往形式為存在對象變成了偶然的個人。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交往形式是因著對生產力的適應或因著對個人要求的自主活動的適應發生新舊更替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要這樣說：「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之間的差別，不僅是邏輯的差別，而且是歷史的事實」。⁷在梁生寶的時代，作品中所描寫的事實與社會歷史中的事實是否一致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單就作品所描寫的事實而言，「整體」在使每個「個體」在利益獲得的同時，達到了「生產力與交往形式或個人活動與交往形式相適應或相諧調」，從而「個人是一定程度地實現著其個性的個人」「集體」在一定程度上也相應地是「真實地集體」，與之相應地，個體生命塑形中的構成成份及「個體」不被「整體」認可的地獄感、「整體」對「個體」的威懾力，雖然也有著或潛在或外顯的負作用、負面性，但畢竟積極因素佔據主導地位，但由於「在整個歷史過程中，交往形式是因著對生產力的適應或因著對個人要求的自主活動的適應發生新舊更替的」一旦在「新舊更替中」「交往形式」與生產力與個人活動不相適應或不相諧調，「個人」「集體」和性質歸屬及相應地個體生命塑形中的構成成份、「個體」不被「整體」認可的地獄感、「整體」對「個體」的威懾力也就會發生相應地質的規定性意義上的顛倒，而在這之間，是有著血肉般地一體粘連，是有著氣脈上的一體相通的，50年代的梁生寶們與發生在60、70年代的十年浩劫之間，是不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的。

第二，當著「個體」是「有個性的個人」，「集體」是「真實的集體」時，我前面所析的梁生寶的青春及青春屬性是美麗的可愛的，反之，則是醜陋的可怕的。一位著名學者在反思十年浩劫時期青年的暴行時曾指出：「青春是美麗的——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國作家、現代知識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但是，現在，我們必須正視：青春是可怕的」這位學者還引述了米蘭·昆德拉的名言：「青春是一個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著高統靴和化妝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個舞台。他們在舞台上做作地說著他們記熟的話，說著他們狂熱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話。歷史也是一個可怕的东西：它經常為青春提供一個遊樂場——年輕的尼祿，拿破侖，一大群狂熱的孩子，他們假裝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態會突然真的變成一個災難的現實。當我想到這一切時……我突然之間把他們的罪惡僅僅看成是期待著長大的煩躁不安」。這位學者指出：「我們這個民族從五四時期就不斷呼喚青春，這絕非偶然，它表現了中國現代民族蓬勃向上的精神，也顯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並認為這二者是互為一體的，他仍引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說：「人世間凡屬於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屬於魔鬼」。⁸如是，從《創業史》中梁生寶的創業，到十年浩劫紅衛兵的敗業，從上帝到魔鬼，這之間潛在的衍化是甚麼，就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必須深思而又令人感到十分困難的問題。

第三，當著「整體」「在最初一段時期裏證明他們確有能力改善現狀」從而使處於絕境的「個體」自覺投入「整體」懷抱時，如何在此時仍然保持「個體」的自覺，避免「有個性的

個人」淪為「偶然的個人」呢？在《創業史》中，當著眾人都以梁生寶為中心圍繞在梁生寶身邊時，惟獨與梁生寶關係最為密切的改霞卻離梁生寶而去。改霞之所以能離梁生寶而去的成因有兩個：一個是基於其自身根本利益的對自身對梁生寶的清醒審視，用作品中的話說就是：「世界上的大學問家，不見得有戀愛的閨女分析男方那樣深刻、細緻」。導致改霞離開梁生寶的另一個成因則是，對於改霞來說，有著「外在」於梁生寶的「工廠」的存在與召喚。如果我們把改霞、梁生寶置換為「個體」「整體」的話，也許對我們思考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會有所啟示吧。

由改霞這一類脫離「整體」的「個體」，我們不由又想到另一類最終不能進入「整體」的屬於「另類」的「個體」，這就是小說中素芳的形象。

建國後的十七年是一個「集體」至上的年代，「宏大敘事」關注的是「集體」的利益與命運，不在這一「敘事」範圍的個體生命只能被打入「另冊」，他們無權分享「歷史進步」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在「集體」獲取利益的興高采烈中，他們的個體生命反而在進一步的被殘損之中。其殘損的形態與根源是甚麼，「另冊」中的個體生命與「正冊」中的「集體」命運的關係又是甚麼，正是這些，構成了我們研究素芳這一形象的意義。

在作品中我們看到，當著作者所敘述的梁生寶在「歷史前進」的潮流中，帶著互助組這一「集體」步入社會中心走向「幸福生活」時，素芳的命運卻進一步地惡化了，她不僅未能從偏居一隅的不幸的家庭中掙脫出來，反而進一步地淪為被社會所唾棄的反動富農姚士杰的性奴隸，被姚士杰所玩弄所利用，也為其時社會所不齒。是甚麼使素芳不能進入這一「集體」呢？頑固、守舊的公公不讓她邁出家門半步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卻是梁生寶也就是「集體」對她的拒絕。素芳曾經變盡辦法去接近、親近梁生寶。誠然，素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無愛的生活中獲取異性之愛的安慰，這在五四時代，本是個性、人性解放的題中應有之義，雖然以扭曲的方式出現，但在《創業史》時代，這卻成為「作風問題，道德品質問題」而為重倫理的「整體」所不容。素芳其後雖然也不乏進入「集體」的渴望：「她向村幹部生寶哭訴，她還沒有解放。她沒有參加群眾會和社會活動的自由，要求村幹部干涉」。如果這時梁生寶不管是在性愛的理解、寬容上，還是在素芳要求參加社會活動上，對素芳援之以手，那麼，素芳是不會被「集體」排斥在外而被打入「另冊」的，但「生寶硬著心腸，違背著自己關於自由和民主的理想，肯定地告訴素芳：暫時間不幫助她爭取這個自由，等到將來看社會風氣變得更好了再說」。那麼，又是甚麼使「甚麼都好」的梁生寶獨獨對苦命女人素芳缺乏最基本的最起碼的同情心呢？

法國思想家雅卡爾在講到德意志民族的悲劇中指出：在集團性的對抗與鬥爭中，一方在把對方作為一個「整體」時，也就把自身組織、整合成為一個「以提高效率為名，建立單一的關係，確立人人務必遵守其秩序的」因而「所有成員之間的關係極其緊密」的「高效運轉的機器」與「整體」。⁹「一個人不是被看作有血有肉自我實體，而是被假想成意識形態、思想主張」的「代表」。作者還試圖說明，為甚麼「在各自家庭裏行為舉止都稱得上好父親」的人，會有著人性與非人性同時共存的「雙重態度」。作者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不過是這個社會中間的一個齒輪而已」。¹⁰

作者論述的是德意志民族的悲劇，但其對個體生命與「整體」關係的思路、見解對我們剖析素芳的悲劇，卻頗有啟示意義。我們看到，素芳正是因其「作風問題」不合「整體」「秩序」的要求而被排除於「整體」之外的。梁生寶正是為了互助組的發展這一「整體」的「提高效率」「高效運轉」而「違背著自己關於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暫時間不幫助」素芳並將

之排除於互助組這一「整體」之外的。也正因此，在其它方面充滿人性「甚麼都好」的梁生寶會「對苦命女人素芳生硬，缺乏同情心」，而這一舉動雖然把素芳進一步推入災難，但卻又顯得那麼合理，那麼應該，那麼充滿了正義感，梁生寶也因此不但不因進一步損害了「不足」損害了弱者而心有負疚，反而因為維護了「整體」而充滿了正義感而心安理得，在他人眼中，梁生寶的形象也因此顯得更為高大，更為可愛。於是，素芳的被打入「另冊」，被打入「另冊」之後個體生命的殘損，也就被合理化、合法化了，其「被吃」的命運也就成了天經地義的應然了。於是，梁生寶以「整體」的名義在進一步損害弱者的基礎上，為自己這一「個體」保護了贏得了聲名、利益也就合理化、合法化了。於是，「整體」在這其中也就暴露了其虛妄的本來面目。即使在這裏，因為篇幅與能力，我們暫時不去追究、窮究「整體」，僅僅就素芳這一被排除於「整體」之外的個體生命而言，如果說，歷史運行以個體生命的犧牲作為代價必不可免，那麼，作為是「人學」的文學，難道也應該對此給以價值認可嗎？雅卡爾說：「在人類歷史上，進步一詞可以指科學技術的進展，它不能用來表示社會的行為」，他還因此說道：「我們不應該重新考慮將人類歷史視為進步的觀念嗎？」¹¹如果說，歷史已經把自身視為人的歷史，那麼，作為是「人學」的文學，又怎麼可以視人視個體生命的犧牲為應然的存在呢？在我們這個群體倫理本位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度裏，個體生命犧牲於整體利益的天經地義，個體生命被排除於整體之外的淒苦無依，一直為人們所認可與忍受，在這種認可與忍受中，被排除在整體之外的個體生命的殘損，終於因為被無視而成為一種無言，終於因為無言而成為一種被無視。在《創業史》第二部的上冊中，當素芳的公公王二直杠被下葬時，當梁生寶在下葬過程中作為「整體」的代表倍受尊重時，在所有送葬的人群中，只有倍受王二直杠壓制的素芳哭得最痛最真也就最反常。被大家認識到的表面壓制素芳的王二直杠在這個世界上是消失了，沒有被大家所認識到的在實質上真正壓制素芳的梁生寶卻依然被視為素芳的拯救者而被大家所尊重，素芳雖然切身感受到了這種壓制，卻又自覺地心甘情願地不反抗這種壓制，反而因為不能歸順壓制者而苦惱，在這樣的一種「無言」「失語」中，也只有痛哭是惟一的表達了。作者說，素芳是因為想到了舊世界對其生父的戕害及對本人的戕害而痛哭，梁生寶也說「這回明白了素芳為甚麼哭得那麼傷心」，其實，他們都沒有抵達素芳那作為集體無意識的心靈深處，只是在今天，這哭聲還時時在我們的耳邊響起，而我們又有幾人能聽明白呢？

馬克思認為：歷史終究也可以說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¹²在市場經濟取代自然經濟而使個體生命終於浮出了歷史地表的今天，回望、探尋共和國創業階段，面對著「整體」的「個體」「蹤跡」，也許仍是一件不失其意義的事吧。

註釋

- 1 例如，幾部作品在人物配置上，都無一例外地分別配置了聽黨的話，積極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青年農民形象；受小農經濟影響較深但又對黨很有感情，因而在理性上同意走互助合作道路，但在感情上卻猶豫不決的老一代農民形象；因了個人經濟實力雄厚，想與互助合作道路一比高低的富裕中農形象；因既得利益而欲個人發家致富阻礙互助合作的黨內代表人物；反對互助合作道路的敵對分子，並以這樣幾種人物代表其時社會的主要社會力量，構成相互之間的鬥爭與衝突，且幾種人物均配以相應地道德品質，如青年農民形象幾乎無一例外地在男女情愛關係上成為主體缺席者，無一例外地將個人情愛犧牲於集體工作。
- 2 例如，在「個體」與「整體」的關係上，均歌頌、張揚了「個體」對「整體」無條件的投入的激情與犧牲的悲壯。

3、4、5、6、9、10、11 分別見於雅卡爾 (Albert Jacquard)、普拉內斯 (Huguette Planes) 著，周冉譯：《獻給非哲學家的小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65；68；64；1；64—65；67；67。

7、12 黃克劍：《人韻：一種對馬克思的讀解》(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295、296、294；294。

8 夏中義主編：《大學人文讀本：人與國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26。

傅書華 河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五期 2004年4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五期(2004年4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